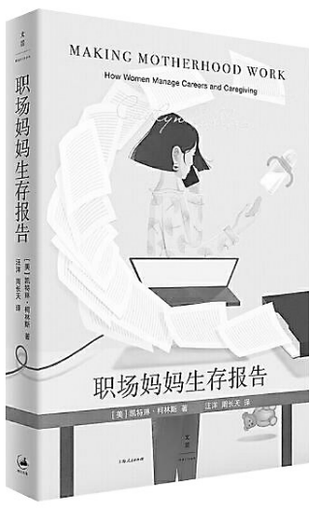
一份职场妈妈的社会学样本

王海宁

提示 **几乎所有职业女性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养育和工作这样的问题，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女性依旧夹在“职场精英”与“家中天使”两种不同的“奉献”模式中，难以脱身。凯特琳·柯林斯花费数年时间，调研了欧美4个国家135名女性职场情况，写成的《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方世界职场母亲的生存地图。而这最初的动力，是她自己母亲艾莉森的经历。**



艾莉森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亲工作妈妈，就是那种穿着套装带着孩子出现在办公室里的女性管理者，依赖保姆、邻居和朋友帮助照料子女，自己意气风发给男员工开会的职场女性。她的母亲想拼尽全力向两个女儿证明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艾莉森要成为美国董明珠的时候，一切戛然而止。她被频频辞职的保姆、不能承诺伸出援手的亲友，还有对她因为照顾孩子请假而不满的上司以及同事，最重要的是被对两个女儿的“歉疚感”打败了。艾莉森最终放弃了大有前途的事业，选择了报酬低，福利差，但工作时间更灵活，让她可以有时间做母亲的工作。直到20年后，当她想重返职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已经被视为老古董。艾莉森对女儿们没有愧疚，但对自己却永远有巨大的遗憾。

凯特琳母亲的故事今天依旧在不断上演。

凯特琳的田野调查，广泛访谈，选择高福利的瑞典、德国，以及执行时偏向家庭福利政策但当时处于金融危机的意大利，还有奉行个人主义低福利的美国。

4个国家的妈妈，如同生活在平行世界，也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妈妈们遭受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并不应是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过错”。

假期政策制定本身就是一种倾向

在职场妈妈满意度最高，就业率也最高的瑞典，根本没有“职场妈妈”这个词。作者当初发现这一事实时，跟我们一样吃惊。

瑞典对产假和育儿假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就将育儿和照护视为“男女双方”的责任。

瑞典父母共享有480天的带薪育儿假，父母可以平分，每人休8个月，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480天。2016年为了更明确地要求父亲们利用育儿假，强制父亲和母亲各自需要休至少90天，因为“不休作废”。所以瑞典父亲们与母亲们平分天下地出现在游乐场、学校、课外班门前，熟练而愉快地分担着养育责任。孩子在12岁之前，瑞典父母双方都享有120天的“育儿病假”，薪水是80%。这与大多数国家孩子病了，就是母亲请假照顾的天然惯例完全不同。

因此在凯特琳采访过程中，所有瑞典母亲在工作时分享“我怀孕了”这一消息时，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政策让她们的上司与同事无论男女都乐于在4点以前结束工作，去接放学的孩子，而且必要时休假，对孩子成长负起责任。男女在育儿假上的完全平等，建立新的社会文化风气，怀孕不再是让女性在办公室被侧目的理由。

而与之相对应的，在意大利男性陪产假近几年才延长到4天。由于美国全国性统一的产假规定只有12周，还需要员工符合一系列严苛的规定，所以美国女性一旦宣布怀孕了，老板常常是直接表达不满，随之而来的就是变相的解雇与降职。因此在4个国家中，意大利和美国两个国家女性就业率最低——政策明摆着到底支持谁在家带孩子。

假期政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政策与文化互动，依旧会影响职场女性的权益平等。

德国产假一度长达3年，也有对父亲的强制短期休假规定，同时对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一份相当优厚的补贴，听起来相当不错的福利，却让有职业抱负的母亲抱怨不已。

德国地区的文化是期待母亲能够至少在孩子3岁前自己照顾，一旦母亲很早出门工作，就被传统妈妈视为“乌鸦妈妈”“事业狗”，即“不负责任的母亲”和“野心过度的母亲”，这种舆论压力本身就让德国的职场妈妈被愧疚压垮。3年的产假让一些妈妈安然照顾孩子，也让雇主对雇用女性更加心怀顾虑，而且女性一旦中断事业太久，很难东山再起。

由于德国育儿补贴比较丰厚，相比上班的妈妈还要缴税，等于妈妈上班增加的收入还不如全职妈妈伸手得到的多，这无形中变成了对职场妈妈的一种隐形惩罚。而且这种政策等于在无声地鼓励母亲多留在家中照看孩子，不出门工作，这让许多受了高等教育的母亲郁闷不已。

幼托服务的提供，也极大影响着母亲对于事业和家庭的选择。2014年瑞典大约一半的2岁幼儿进入日托机构，而3岁至5岁的儿童中95%都会参加日托。瑞典国家福利中对幼托投入巨大，幼托服务优质普及且收费低廉，瑞典妈妈觉得孩子去幼托是与同龄人开心地玩耍而不是受罪，她们也因此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工作。而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都面临着公立低龄幼儿园的极度短缺和收费昂贵的问题，因此那里的妈妈如果在孩子3岁前去上班，就会更加自责，她们对把孩子送去的地方顾虑重重又不堪重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留在家里，而让爸爸出门赚钱。

市场购买服务和依赖亲友成为新的矛盾发源地

意大利和美国妈妈由于福利较少，是从市场购买家务和育儿服务较多的两个母亲群体。但是她们通常雇用的也是“互惠生”或者移民，这两个群体都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薪资也常常过低。意大利妈妈会雇用低薪的移民家政服务员，美国妈妈最为疲倦，她们中的白人女性通常已经比其他有色人种生活相对容易些，而她们雇用做保姆的移民或者有色人种本身往往也有子女需要照顾。

疲惫不堪的职场妈妈为了保住饭碗，就要雇用比她们境遇更差、薪资更低的女性，来坦然地维系目前的生活，这是转嫁了不公。

流行美国职场“单向荣誉模式”，以及传统母亲的刻板印象，是妈妈们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源头。

单项荣誉模式即员工认为自己就该为他们的公司努力工作和奉献，并且不应要求什么回报。那些花了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反过来“密集母职”的育儿文化又不断强调母亲对于年幼孩子的作用和意义，同时社会又不能提供其他支持与服务，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给他人的女性则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

这个观念陷阱让女性夹在中间痛苦不堪。其实它忽视了女性生活的广义环境——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照顾，而照顾是有价值的，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养育的儿童会成为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和纳税人，如何照料他们是所有人的责任。当然这种认知在国土面积小、种族和宗教信仰相对单一、收入差距小的瑞典更容易达成共识和实施。

尽管凯特琳希望今后女性宣布怀孕后，不再会像她的妈妈艾莉森那样，被老板踢进地下室办公，但她也承认，自己本身是美国白人女性，由于自身的圈子和科研经费所限，她调查的对象大部分还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尽管她们当中很多人抱怨不已，但仍旧是过得比较体面的一群人。凯特琳的调查样本，对于更多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女性而言，职场妈妈的乌托邦更加遥远。

没有怪癖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何 况

话说有一天，歌德突然造访席勒家，发现朋友外出了，决定等他回来。为了不浪费等待的时间，歌德坐在席勒的书桌旁写些观察笔记。不多一会儿，一股恶心的怪味使歌德停下了笔。怪味是从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散发出来的。歌德捂着鼻子打开抽屉，发现里面装着一堆烂苹果，心想席勒写作时太痴迷了，以至于对如此难闻的烂苹果气味都毫无知觉。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却告诉他，是席勒故意让苹果腐烂的，“这种奇特的气味激发了他的灵感，没有它，他就无法写作”。据说，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及《华伦斯坦》三部曲等，都是闻着这种怪味写出来的。

明朝张岱《陶庵梦忆》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作家都是个性独立的性情中人，因此像席勒这样有奇怪癖好的作家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后现代文学代表作《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只有身穿白色外套、手拿蓝色大蜡笔才能写出东西；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对不同颜色的纸有不同感觉，他几十年来都在蓝色纸上写小说，在黄色纸上写诗歌，在粉色纸上写随笔，没有相对应的纸就写不出那类体裁的作品；伍尔夫只用紫色墨水写信、记日记、打草稿，抄清则用绿色或蓝色，决不混淆；托尔斯泰写作时，喜欢在写字桌的一角摆上一面镜子，为的是便于随时从镜子中观察自己脸上的表情像不像笔下人物的表情；罗曼·罗兰也总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法国作家司汤达为使文笔声调铿锵，每天早上都要读两三页民法；美国作家爱伦·坡总要把自己心爱的猫放在肩头，然后才开始创作；美国当代女诗人艾米·克兰皮特无论是在宁静的海滨或喧嚣的闹市，乃至于奔驰的列车上，她总喜欢久久盯着窗户玻璃，据她说，玻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射效应，只要盯上一会儿，便会才思如涌；海明威习惯于站着写作，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他的“电报体”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不同作家对写作环境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经常带足干粮和水，驾一叶扁舟去海上，在这样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他写起来得心应手，进展甚快。丹麦作家安徒生则喜欢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一进入森林王国，他的艺术想象力就格外活跃。中国作家陈忠实写《白鹿原》，先后花了5年时间在偏僻的山村里写作，他说：“写作《白鹿原》书稿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封闭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相反，英国作家司各特写作时经常故意把邻居的一大群孩子请到书房里玩耍，并要求他们高声谈笑。

有的作家对某些数字特别敏感，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绝对不会在星期五开始或结束一部作品，他作为一名老烟民，在写作时放入烟灰缸的烟头从不超过3个，多余的烟头他会塞进外衣口袋。喜欢使用铅笔打草稿的约翰·斯坦贝克为了不因削铅笔而影响写作的连贯性，动笔之前总要在书桌上不多不少摆放好12支削尖的铅笔。

说到数字，许多作家对每日要完成的写作量有近乎苛刻的要求。杰克·伦敦在职业生涯中坚持每天写1000个单词，托马斯·沃尔夫坚持每天写1800个单词，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2000个单词，威廉·戈尔丁、诺曼·梅勒、柯南·道尔坚持每天写3000个单词，雷蒙德·钱德勒坚持每天写5000个单词。

最近法国媒体对许多知名作家作了一次调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怪癖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为什么呢？《美国墓地》的作者梯也尔·艾思说得好：“如果你想创作，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一些与日常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的时刻。”他早晨4点钟开始工作之前要大声朗读福克纳、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作品中的那些“充满能量”的章节。《为了一位同龄女子》的作者多米尼克·法布尔表示，他在家里写不出一个字，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车间，一个保姆房，或者是在一个已经去度假的女同事家里”，反正不能在自己家里。看来作家真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

为地球写“历史传记”

曲 宏

提示 **碳排放对地球有什么危害？这就要说到地球的历史。只有重构地球历史，才能准确揭示自然界的“规律”。但重构的路径只能通过历史上幸存下来的证据，这必然是一条曲折又充满争议、需要反复科学实验检测的道路。《深解地球》追溯地球历史的发现进程，从人类对地球的早期想象到21世纪初科学家对地球史主体轮廓的共识，解开了地球历史的许多谜团。**

《深解地球》的作者马丁·拉德威克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得主。书中描述了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人类历史学家、海洋学家等专家为重构地球历史做出的独特贡献。地球历史重构过程其实也是人类对地球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

马丁·拉德威克展示了在地球历史研究中历史维度发挥的关键作用。历史维度是在人类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概念，而把这种方法和概念转移到自然世界的研究上，是一个思维创新。把山脉、火山、岩石和化石作为自然历史产物，从现在保留的特征中寻找历史的足迹，意义非凡。仪器探测、大地测量、实验室分析测试与科学实验等被引入到地球历史的研究之中，提升了研究的科技含量。试想，如果没有放射性理论、没有纹泥等理论实践，也就不会有地球历史的量化证据。那么，关于地球历史的许多观点可能还是空中楼阁。1905年，在英国工作的新西兰籍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利用玛丽·居里发现的新元素镭衰变成氨的可测量速率判断放射性矿物样品的年龄，从而开启了放射性测年法。此后，该方法和依据的物理学证据变得越来越准确和稳定，并逐渐转变为常规程序，成为地质学中一个强大且不可或缺的工具。19世纪后期，瑞典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判断，湖泊沉积物的薄沉积层是每年季节更替的记录。经过多年校准，整个纹泥序列可以被准确标注日期，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纪年。建立在纹泥基础上的精确地质年代学也随之诞生。这样，地质学的定量分析和时间尺度为地球提供了大事年表。此外，通过钻探冰层取得的冰心显示出类似纹泥的层理结构，可以追踪大气成分的变化；通过冰心中的尘埃痕迹，可以识别古代的火山爆发，并为其确定日期。而地球磁场的发现又提供了另一个新的相对测年法。正是这些科技的进步成果，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了地球无限悠久的复杂历史。

那么，地球复杂的历史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存在哪些科学关系？《深解地球》不仅仅告诉你一个结论，还把发生的科学原理阐释得细致入微。如果仅仅是推测性的结论，它也会告诉你这种观点的脆弱性。论据的充分展示、科学解释是《深解地球》的显著特色。论证过程写得深入浅出，是很不容易的。那些深奥的科学论证，被化为通俗可读的内容，但丝毫未降低内容的权威性、理论高度和内容厚度，这就是马丁·拉德威克的过人之处。《深解地球》在讲述德国气象学家、地质学家魏格纳“大陆漂移”说面临的各种争议时，更多地讲论据、讲论证过程，这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魏格纳的证据起初虽被认为是单薄的，但其依据也不容忽视：格陵兰岛的经度测量表明该岛正在缓慢漂移；欧洲和北美洲的地层和化石记录证明，在石炭纪时都处于热带，但到了更新世气候却发生了逆转。其他的还有南美洲的凸出部分与非洲内凹部分恰能拼成一个整体。围绕这个论点，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给魏格纳解释的机会，一派认为这不切实际。美国不止物理学家，许多地质学家也加入到批评行列。美国地球科学家普遍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科学方法的理念和规范方面：魏格纳缺乏令人信服的自然原因，魏格纳缺乏自己实地考察的证据，美国科学家不愿承认欧洲人提出的新理论，不承认其观点是报复德国人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后来英国地质学家霍姆斯提出的深层地幔中可能存在巨大对流系统的理论支撑了“大陆漂移”说。因为地幔对流有可能撕裂大陆。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的同类研究进一步证实和强化了“壳下对流”概念。而当大陆架海洋学调查与早期计算机运算结合起来时产生的调查结论，使这一学说证据充分，四脚落地。美国科学家也转而支持这一学说。20世纪60年代，除少数死硬派之外的人都接受了“大陆漂移”说。这样的理论交锋在《深解地球》中并不鲜见。

地球只是广袤宇宙中的一个行星，那么，人类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深解地球》构建了开阔的研究视野，不仅研究陆地，也研究海洋，研究宇宙；不仅研究地球现状的过去，也研究必然到来的未来，即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深解地球》对宇宙太空的研究让地球历史找到了应有位置。在传统观念里，人类与地球似乎是同时存在的，人类是地球历史这出戏剧的主角。但重新构建的“古老地球”，人类是很晚时才登上世界舞台的。“古老地球”的大部分时间没有人类的任何痕迹。人类也是地球历史上当然的配角。

从地球的角度看，人类是沧海一粟；而从人类的角度看，地球的历史却又是难以想象的漫长，足以让人类对自然产生深深的敬畏。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减少碳排放之所以成为人类使命的深刻意义。

■聊书

从阅读《爱玛》开始发现某种道德指南针

丁春凌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这是一个关于母亲的寻找。

马里乌波尔在哪儿呢？

在乌克兰东南部，有长而宽的沙滩，是一个温暖的小城。

俄裔德国作者娜塔莎·沃丁的母亲就来自马里乌波尔。1956年，在沃丁10岁的一天，母亲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未留下只言片语。后来才知道，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了，时年36岁。那之后，沃丁才发现自己对母亲一无所知。直到2013年，沃丁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有关母亲的线索，沃丁开始打捞母亲的过往。她要弄明白，在母亲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4年里，有关母亲的碎片一点一点地被沃丁拼凑起来，母亲及其家人的遭遇浮出水面：母亲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大家族，1943年作为劳工被驱离乌克兰，前往德国强制劳役。二战结束后，母亲嫁给了一个俄国翻译，是个酒鬼。

最黑暗的时刻，母亲撑了下来，但最终却一句话不留地告别了这个苦痛的世界。

说真的，没有人有资格说沃丁母亲为什么不活下来。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她经历过怎样噩梦般的灾难。

在试图还原母亲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沃丁满含深情，写得充满悬疑。每次她在找寻中，我都担心线索会断掉，真是比虚构更魔幻的非虚构。

合上这本书，我又找来了电影《卡廷惨案》看了一遍。

再一次心碎。

《脉动中国》

这书好几个人和我提起过。

我冲着许纪霖的名字下的单，在某多上买的，19.36元，真是便宜，因为某当上卖65元。

拿到手里，哎，挺坑。

从纵向的时间脉络来说，许纪霖讲的是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从文化的传统展望我们民族的未来。站位很高。从横向的空间结构来说，许纪霖的本意是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框架，梳理咱们中国人的道德心灵秩序。站位也不低。

可是，太浅了。比如，关羽的马是白的？

入门级，大量的口水话，不像许纪霖的语言风格。

《我信仰阅读》

这本书书影很跳，明黄色，近400页，是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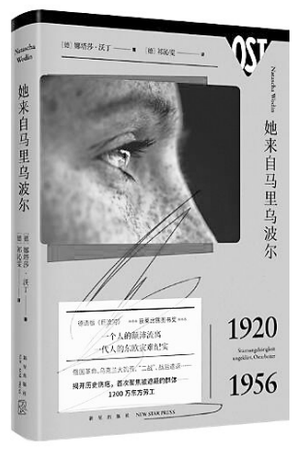
先从目录捋一捋。看戈特利布的履历，慕然。这个家伙常年“折腾”，差不多活了别人好几辈子的人生。他用14小时看完了《战争与和平》，几乎是一口气，还曾把自己关家中一个星期，7天读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戈特利布是个勤快人。工作后，他的午餐天天是三明治，不会为了接待什么人外出就餐，因为舍不得浪费时间。戈特利布不光当过西蒙·舒斯特和克瑙夫出版社的总编辑，还当过《纽约客》的掌门人。经他之手出版和编辑的作品，搭眼一望，我这辈子估计是看不完了：一本书看破世间所有骗局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普利策奖得主约翰·契弗的日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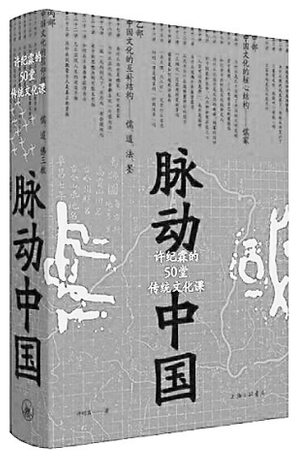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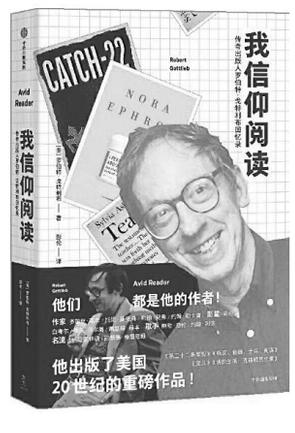
这是一长串耀眼的书单。

多亏了有罗伯特·戈特利布这样的伯乐。我喜欢看自传里那些名作出版背后的故事，波折不断，更是喜欢戈特利布说自己16岁初读《爱玛》后那段话——当我读到爱玛在博克斯山野餐的那一个著名场景中，羞辱落魄的、不招惹别人但爱说话的贝茨小姐时，我的心里充满羞愧：这一幕鞭策我审视自身随意、不善待别人的行为。简·奥斯汀把我钉在了墙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把阅读的体验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是小说，从阅读《爱玛》开始，使我发现了某种道德指南针。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脉动中国》



《我信仰阅读》